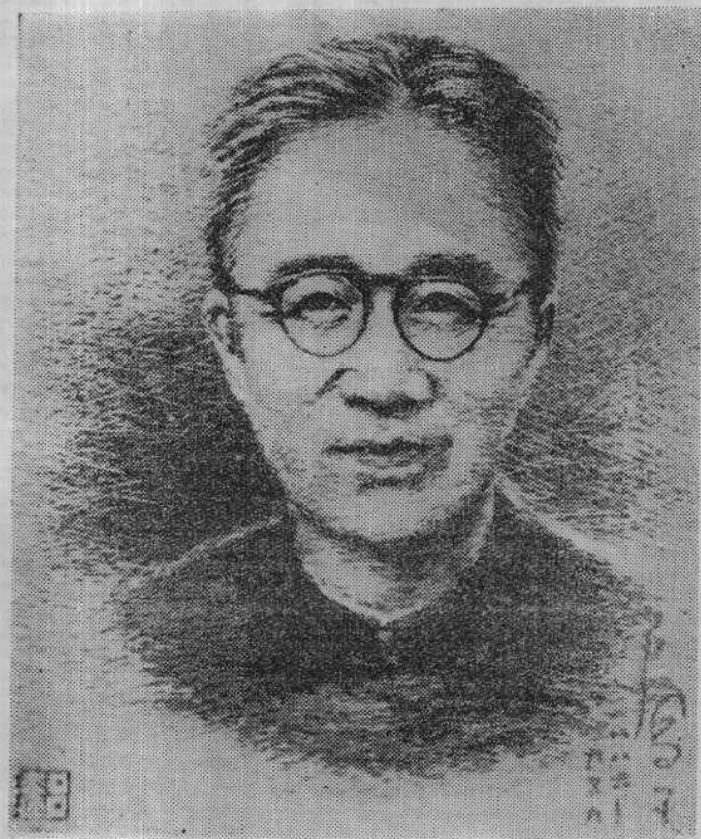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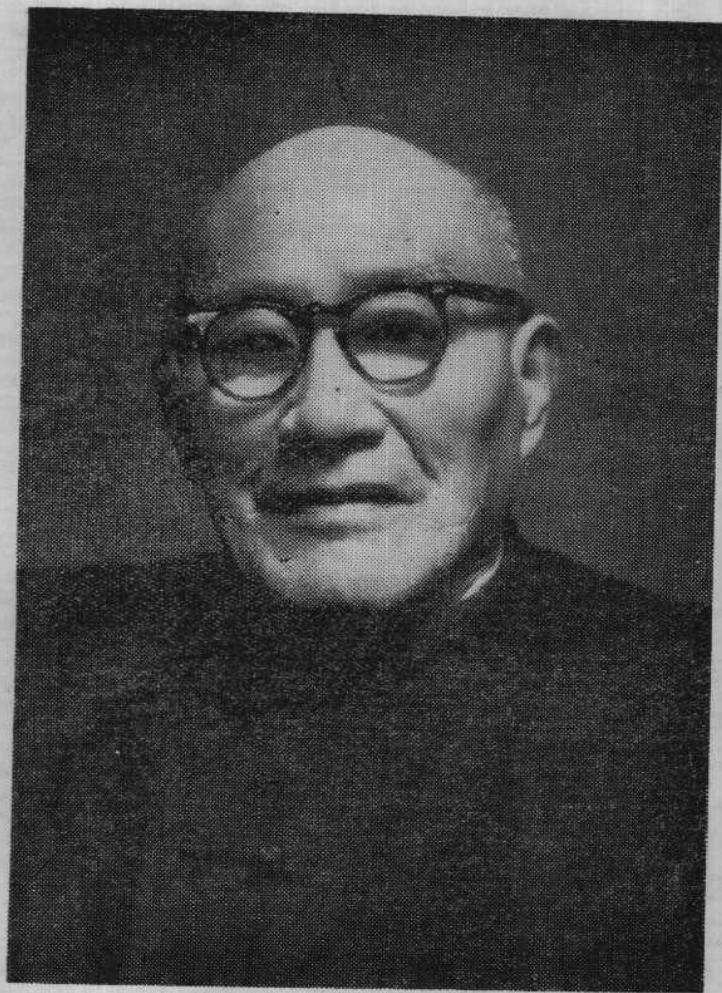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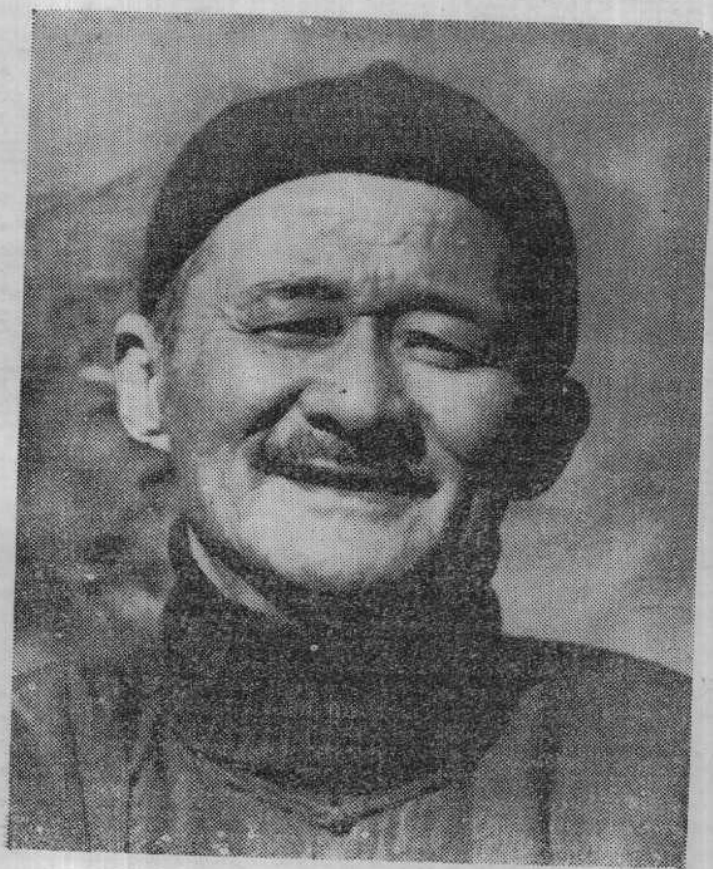




吕凤子先生遗像
(乱针绣 吕去疾作)



陆小波先生遗像



严惠宇先生遗像

目 录

反帝爱国老人 <u>马相伯</u>	韩景琦 (1)
抗战时期的吕凤子.....	吕去疾 (26)
抗日从戎的镇江十七位青年学生.....	李之 戴午林 (38)
纪念杨瑞年烈士.....	向锦江 (47)
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亲历记.....	吴金铭 (50)
抗战期间江苏省教育厅掠影.....	任荣章 (58)
焦山抗战和沦陷.....	王凤智 (65)
东乡三大寺被焚记.....	王 冰 (69)
日军在镇句的暴行.....	本多胜一 (71)
解放前冷御秋先生和我党交往片断.....	陈云阁 (77)
镇江地方势力与“立委”、“国大”选举.....	杨方益 (79)
伯父陆小波二三事.....	陆汝纯 (109)
陆小波先生事迹纪要.....	许图南 (118)
陆小波先生处世管窥.....	史 勤 (128)
忆惠师.....	李家本 (147)
我们所知道的 <u>严惠宇</u>	姚其苏 杨方益 (168)
著名银行家陈光甫.....	蔡墨屏 (178)
<u>陈光甫</u> 与上海银行.....	高禾生 (202)
镇江商团始末.....	尤燮方 (213)
镇江肴蹄与宴春酒楼.....	蒋志云 (220)
易君左及其《闲话扬州》.....	顾一平 (241)
计成与《园冶》.....	昌 农 (249)

反帝爱国老人马相伯

韩景琦

一八四〇年四月六日（清道光二十年的清明），在镇江府丹阳县北乡马家村诞生了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马相伯先生。在他出生后不久，就举家搬到镇江城中去了。

先生谱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他家世代信奉天主教，在他出世不久，就受了洗礼，教名若瑟。父亲松岩公，布衣授徒，兼通医药，先后在家乡和镇江城中开设药铺和米店，还做医生；乐善好施，一八七二年逝世，享年七十五岁。母亲沈太夫人，是一位典型的良妻贤母，一八九五年逝世，享年九十一岁。胞兄建勋，胞弟建忠，妻王夫人，子君远，女宗文，孙女玉意，曾孙纪龄，曾孙女百龄、千龄。

先生少时，敏而好学，却对老师在四书五经上的烦琐考据，不感兴趣，曾说过：“即使先生所背这些经解不错，但对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而对天象运行，往往要寻根究底，又得不到明白答复。他深感在家乡找不到一个可以满足他求知欲望的好老师。

一八五一年，他十二岁，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背着父母私乘民船从镇江溜到上海。由于他是天主教徒，所以他直奔徐家汇，到圣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现名徐汇中学）要求入学，学校也就收容了他，学名马斯藏。由于勤奋

学习，他受到校长晁德莅（意大利人）的赏识。他在丹徒入泮的第二年，江南举行选试，他去南京应试，发榜时，恰巧太平天国革命，闹得南京城人心惶惶，他就匆匆回到上海。晁看到他中国文学颇有根基，虽然他还只有十四岁，便叫他在学西文和自然科学的同时，担任低班级国文和经学的教员，他不但学业进步而充实，又得到教书的经验，在校受过多次奖励。他的外文如拉丁文、法文都学得很好，十八岁时，法国领事馆请他去当翻译，他说：“我学法国语，是为中国人用的。”请他的人很惊奇，也只好作罢。学校派他到苏州、太仓等地，从事救护难民的慈善工作，他不计辛劳，全力以赴，累出一场伤寒病，僵卧了六十多天，有四十多天不能饮食，奄奄一息，几乎死去。经过治疗，虽已康复，可是对以前读的书，忘记的干干净净，经过一年多拚命用功，才慢慢恢复原状，而读完了徐汇公学。

一八六二年，耶稣会在上海设立初学院，先生进院当修士，接受“神修”训练二年，又研究中国文学和数学。后又入大修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一八七〇年，他得神学博士，被授为耶稣会“司铎”（神甫）。

一八七一年，先生奉教会派赴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人民深陷苦难。他请求父亲拿出一部份家财救济难民。可是教会却认为有违禁例，对他有所责难。他却认为周赧贫困也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而尽了做人的本份。这种非难都是从外国教士的偏见和私怨出发的，他开始对教会有不满情绪。翌年，教会调他担任徐汇公学校长。

他的学生应童子试，先后考中六十余人。教会深恐他将学生变成“异教徒”，乃又派他兼任耶稣会编撰，并嘱他研

究数学，以分他的心力。他化了年余心血、译著了数理书籍百余卷，名为《数理大全》，教会却不予刊行。后又不要他做校长，派他专门研究天文学，可是没有仪器，无法研究，又调他到南京专任编撰，却又不刊行他的译著。因此加深了他对教会的不满。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教会对待外籍教士和中国教士极不平等，外籍教士都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往往盛气凌人。因而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一八七六年，他毅然脱离耶稣会，不再做神甫。但他仍信仰天主教。

先生经胞兄介绍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充当幕僚。一八七七年，余兼任山东巡抚，就把藩司官章交给他代拆代行。经余的介绍，在山东他和当地一位书香门第的王氏女结了婚。后又委他以候补道，接任山东潍县机械局长。

这个机械局，专制造枪械和火药；但相当腐败。局长下有一、二十个候补官员，工人二、三百人，还有二百多卫兵。局长薪水五百元，是山东候补道中最高者，向视为美差。可是在他接任前，每十天才出一支枪。而造子弹火药都用土法。他到职后，立改西法制造火药，要合银三钱五分一斤的成本，但呈报到户部，却被驳回。说是照例火药每斤只费成本七厘，如何现在要三钱五分一斤，批了个“不准”。实际上，从前用土法所造火药，成本虽轻，但产量低，质量差；用西法造火药，产量高，质量好。可是不准就是不准，无理可讲。他气得写信给在户部供职的朋友杨谷廉，请他代为设法，杨回信说这事好办，只要把“斤”改为“磅”，重新呈报上来，定可批准。先生将信将疑，照此办理，果然，不久户部回文到了：“准为所请，实报实销”！试想以前三钱五分一“斤”（十六两为一斤），说是太贵了而不准，后

来三钱五分一“磅”（十二两为一磅），倒反而批准了。这反映出清朝政府的官吏已昏聩无知到何种地步！

上面所提到的杨谷廉是个深谙官场诀窍的人，他曾经告诉马老，如上公事给李鸿章，到了公文的末尾，总要故意弄出一、二句似通非通的话来。李虽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日理万机，但他书生积习未除，凡僚属呈文，遇有不通之处，一定要援笔批改，改过之后，这件公事，便立即发下施行。若是公事做得一点瑕疵都没有，他看过了便朝旁边一放，那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把它批下来。杨并说这是屡试屡验所得出的结论。马老感慨地说：“一个身当大任的人，只要有一点短处，左右就要乘隙而入”。

过了一年，他就交卸了这件差事，离开山东。不久李鸿章又派他到山东去调查矿务，这样他又回到山东半年。他从政三年以来，深深感到清朝官场的腐败无能，还是洁身引退为好。

一八八一年先生应驻日公使黎庶昌之邀，赴日本任使馆参赞。他和日本维新要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交往，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认识。是年秋，因兄病回国，又应李鸿章囑，去天津协办新政。

一八八二年，朝鲜的部分统治者在日本煽动下，图谋“独立”，清廷派提督吴长庆率兵到汉城坐镇。吴请先生同行。适朝鲜政府要求李鸿章推荐办理新政人才，李决定由先生赴朝。朝鲜国王李熙聘他任政治顾问。他“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兵”，“次则整理外交”，同时向朝鲜国王提出全面改革内政的条陈：一省刑罚，二定刑典，三广取才，四恤奴婢，五求富庶，六慎疾病，七兴工艺，八兴学校，九正经界。惜朝鲜政府积弊太深，延缓不办。后来他感到朝鲜局势已无法挽

回，在次年回国述职时，曾向李鸿章提出应早决定政策，或听其自主，中国与之脱离关系；或重行干涉派干练大员率兵前往，作有力之指导。李鸿章叹息地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先生讲过：“中国者放大之高丽，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他从朝鲜政府的腐败，看到中国的问题，有感于清廷寿命也不长了，乃决计脱离仕途，重度书斋生活，从事科学研究和译著书籍的工作。

一八八五年，李鸿章有感于招商局办理多年，成效不大，决心整顿。任命先生胞弟建忠担任招商局总办，同时请先生帮助，代李到全国各地调查该局究有多少财产。从天津、汉口、烟台、上海、厦门直到广州，整整花了两年时间。经过他详细调查研究，认为“商局情弊，非改弦更张，难期振刷”，揭露了各种弊端，提出了《改革招商局建议》。惜当时总理衙门对招商局兴革抱观望态度，未能实行。

先生在广州时，看到香港被英人占去后，商业发达，不但广东商业受了影响，就是英国人以外的外国人也感到压迫，引以为苦。他给两广总督张之洞提了意见，把香港对过的九龙辟为商埠，建筑市场，招引中外商人来做生意。还要修一条铁路直通广州，外国人也赞成他的建议。可是张之洞听了之后，满口说好，就是没有下文。后来他回天津时向李鸿章提及，李也认为是个好主意。根据惯例，还得要张之洞具奏，李不好出面，仍等于零。过了几年，九龙竟又被英国强占为商埠。

在他乘轮北返时，触礁遇险，滞留厦门。台湾总督刘省三电邀他去台湾。他建议刘借外债来开发台湾的经济，并整顿军事政治，再以余力帮助中国本部实业的发展。刘虽然认为建议很好，但不愿负担向外人借贷之责任，建议又成了

“纸上谈兵”。

那次乘船遇险的情况如下：从广州乘怡和轮在福建海面触礁，船长便命把下舱（三等客舱）关闭，这样一来，很可能活活把那一舱中国乘客淹死。他当时住在顶头的官舱（大餐间），听到这一消息，立即向船长交涉，要他开放上舱舱门，让下舱的乘客都上来，不然，将来要到英国公使馆去告他，船长不得不照办。一船人在这破船上守了三天三夜，才被舢板船救出，送到厦门。

一八八六年，李鸿章因创办海军而缺乏经费，招先生昆仲商谈说：“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只给五百万两银子，怎能办得好？”他俩建议向美国商人借款，组织银行，发行纸币，整顿金融，开发矿产，修整铁路等，从而搞活经济，又可解决经费匮乏的难题。李也认为可行，乃请先生赴美接洽借款。当时美国资产阶级渴望输出资本，因此他在美国备受欢迎，商订以五千万为正式借款，以三亿为银行存款，三厘起息，然后视中国对于财政需要之缓急而应用。由于清廷顽固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矛盾尖锐，李鸿章遭到攻击，乃电先生：“办法适当，朝议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这使先生进退维谷，只有黯然离美，改赴欧洲。到英法访问，考察商务，参观牛津、剑桥大学，顺道罗马，觐见教皇宗良十三世。经苏伊士运河回国，向李鸿章谈借款事，都认为很好的事被他们弄糟了。李鸿章叹口气说：“政府不想好，有什么办法！”

在马相伯赴美借款及访问欧洲期间，颇多趣闻，足资谈助。当他到纽约时，美国总统特派侍从武官迎接，美国银行界各巨子，都和他相会。他在中国带了许多缎子和茶叶，分送给他们，被视为从未见过的珍品。据说有一位银行巨子，

特地向他要匹黄缎，做了一身衣服，引得大家羡慕不已。至于茶叶，他们不晓得怎样吃法，他又煮给他们饮，也得到很高的赞赏。他在美国听到一则传说，使中国人哭笑不得，难堪至极。原来在中国使馆楼房上，晴天时屋檐下往往飘了许多白布长条子，美国人觉得奇怪，以为中国使馆挂什么旗呢！一打听，却是中国使节太太小姐们的裹脚布！可见清廷外交失败，大都是由于朝廷官员懵于国际形势，应对无方，动辄得咎；加上没有常识，举动荒谬，引起大家的笑话。事例很多，此仅一例。

他从美国渡大西洋赴英国，在利物浦上岸，转道伦敦，当他刚刚踏上利物浦时，沿途有十六、七岁的姑娘们，看到中国人，感到新奇，紧跟着他们跑，中国人看了也很惊奇。在中国同样年龄的姑娘们，决不会有此举动。那时在伦敦所乘的马车，很引起人好奇，乘客在前，马夫在后，用的缰绳和鞭子都格外长，跑起来感到异常有趣。在英国参观牛津大学时，看到大学里都保存着许多名人肄业时的座位，作为胜绩，任人瞻仰。他看到英国的学风，仍是欧洲大陆的传统，重视古文，拉丁文、希腊文都是必修科。在美国已逐渐注重科学教育，学生加紧吸收科学知识，对于文艺的研究，逐渐偏废，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籍早就不读了。后来英国也逐渐转变，重实事而轻文艺。这个学风的转变，可说是受了近代科学文明的影响。

从英国转赴法国巴黎，那是一八八七年。巴黎晚上一股通用煤汽灯和大蜡烛。马路上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石子路。巴黎有一家“南京公司”，为什么叫中国南京的名字呢？原来这与中国所产的紫花布有关，中国产的紫花布传到欧洲，风行一时。据说有人送罗马教皇一匹中国的紫花布，他

如获珍宝，拿来做了一件法衣，向众教士炫耀了一番。这匹紫花布可能还是利马窦从中国南京带到罗马送给教会的，于是就以其产地的地名名之为“南京”。经营这种布的公司，也就叫做“南京公司”了。在巴黎参观了磁器公司，他们直呼磁器为“高岭”，中国最出名的磁器产地在江西，而高岭是江西的一个山名，大概这个山是因产磁泥而出名的，法国人就此来命名磁器了。马在参观后讲：“我有一种感想，美国人那样珍视我们的绸缎，爱好我们的茶叶；而欧洲人又这样喜欢我们的布匹和磁器。如果我们改良工业和对外贸易办法，一定可以得到不少收益。可惜政府和商人都见不及此。”

一八九二年起，先生又一度担任驻日本长崎领事及公使馆参赞。未及一年就回来了。

一八九二年，梁启超到上海来办《时务报》，曾向先生和其弟建忠学习拉丁文。在一年半时间，几乎每天见面。先生对维新运动很表同情，也很重视梁本人。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期间，梁请他筹办译学馆，将告成，由于变法失败而未果。后来他又回到上海，与弟建忠，以西洋文法，释中国古籍，合著《马氏文通》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文法书。后以其弟名出版。一八九九年，先生主持徐家汇天文台事。

一九〇〇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事日非。先生“慨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知制造，”感到这样下去丧权辱国，而深为之痛心。他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兴办学校的紧迫性。因此他有“教育富国”的思想，决心借教会之力来办一所新式大学，教授欧美新知识，

使学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以应救国之需。同年八月，建忠逝世，他不顾年老力衰，毅然将祖遗松江、青浦三千亩田捐献给教会，以为办学的基本金。可是教会接受他的捐献，并没有办学。这时蔡元培执教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南洋公学），和先生住处相近，也向他学习拉丁文，后又从南洋公学中介绍一批师生跟他学习。其中有黄炎培等。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集体退学离校，要求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于是“爱国学校”成立了。那时先生教授拉丁文很有成绩，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在云南、陕西、山西学者，都不远千里来沪求学，人数剧增，也有扩大之必要。先生进而创办了“震旦学院”。容纳四方有志青年，实现了他多年办学的夙愿。教会将他捐献的田产作为学院基金，初创时既无校舍，又乏师资，乃借教会天文台余屋开课，聘请耶稣会教士为义务教师。一九〇三年初开学，先生任监院（院长）。后为了在卢家湾购地建校舍，先生尽其所有又捐出现洋四万元和英法租界地产八处（时值十余万两），他立了献据：

“立献人谨承先志，愿将名下所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会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斧贷所不及，并望为西满安德助献祭，祈求永不废替。中外善堂，概由输献。此系主前熟思，遵先志以献者。自献以后，永无反悔，且系先人所遗名下私产，故族中一切人等，不得过问。其系教中者，自无敢有违善举。其系教外者，则非先父先兄之嗣也，更无得过问。持此书存档。时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年秋分后一日，即光绪庚子八月一日，立献据人江苏镇江府若瑟马良”。

真正做到毁家兴学。在创校时，先生郑重宣称：“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爱国学社成立不久，因《苏报》案牵连而自动解散，学生大都转入震旦。因此震旦学生颇具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者。

同年夏季，陕西青年举人于右任因做诗骂慈禧太后，被通缉而流亡上海，无以为生，马老派人去找于右任到震旦入学，免除一切膳杂等费，还嘱咐于改名刘学裕（是留学于的谐音），以免引起清廷注意。

先生又宣布办学信条：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他虽然是一位虔诚教徒，毁家兴学；可是还得借教会之力支持，而他却毅然向学生们讲：“学校是研究学术的机构，不是宣传宗教的地方”。一反当时其他教会学校以宣扬教理为主的做法。管理方面实行学生自治制度，这又和当时南北各大学堂所奉行的一套压制办法迥然不同，独树一帜，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了民主风气。教务方面也是按照信条规定崇尚科学和注重文艺而安排的，主要是开示门径，启发学生自由研究。当时先生已经六十四岁高龄，还亲自教授拉丁文、法文、哲学等课。他在授课时，语多启发，引导学生，举一反三，学生进步很快，往往一年后就可直接和外籍教师通话了。他教数学，不仅教些演算技术，主要教原理，使学生们都从根本上理解每一道数学题的意义；并教以代数方法演算数学。他的教育方法是值得研究的。他对学生如家人子弟，经常恳谈，循循善导。星期日上午，往往集合学生进行演说，研究时事，讨论学术。他对体育也很注重，规定每星期授兵式操三课，步伐操法，一丝不

苟，有时还率领学生荷枪实弹打靶。有人向当局说他别有用心，他也没有停止过一天。

一九〇五年春天，由于震旦办了三年，成绩显著，教会对学校不宣扬教理，早有不满意，又看到学校办得好，就想夺取学院领导权，处处和先生为难。甚至于不派教士来院上课，作为要挟。实际上其中还有件秘密，那是先生晚年向我谈过的，就是那时学生中反清活动较剧，清廷早已注意，因涉及教会，迟迟没有行动，已一再和法租界捕房联系，准备逮捕一些“过激”学生。先生听到后，坚决不同意，要求教会不要助纣为虐。教会认为有机可乘，提出掌握学校领导管理权，作为保全学生的交换条件。这样先生才被迫同意由教会派南从周神甫来院主持校务。这位南神甫却“尽改旧章”，改变了学校性质，引起学生大哗，认为教会企图把中国学生训练成法帝国主义的奴才，决定全体退学，并把震旦校牌摘下和新添置的校具、图书、标本等一并带出学院。学生们平素在先生教育之下，懂得大事大非，为了抵制外国教会的侵夺，捍卫国家教育主权，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是光辉的一页。

在震旦学院停顿后，不数日由群学会敦请先生为会长，并订期召集离校学生商谈复校办法。会上由先生提出复校意见，并推荐学生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为干事，协助先生进行复校工作；又得到社会名流严复、熊希龄、袁观澜等的同情和赞助；另外先生商得两江总督周玉山同意拨地拨屋和资助经费，复校工作，尚称顺利。可是教会劫夺震旦失败，于心不甘，而抢先招生。这样，先生决定不再用旧名，以“恢复震旦，复兴中华”为寓意而改名“复旦公学”。这座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自力更生创建起来的私

立大学，于一九〇五年中秋节开学。

先生办复旦时认为“西学自有体用，如果只抓它的用，不顾它的体，就不过徒袭皮毛”。因而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学，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教学方面又比震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前进一步，设有经学、政治、文、商、格致、工、农各科及大学预备科等。至于课程除一般常学者外，更设有英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心理学、高等数学、测量、物理、化学、国画、体操、地质、矿物、天文、力学及分析化学等。教师们在教授中都本着“学以致用”的“讨论会”和“演讲会”，为师生活动的主要形式，还出版墙报、校刊、学报、年鉴等等。当时日本《大版新闻》曾评论复旦为“革命的学校”。上海英文大陆报也称赞复旦学生“最富民主精神”。

在复旦马老对演说是很重视的，他认为要演说不流于形式，而应注重内容，又要研究方法和技巧。在演讲会上，他本人进行示范性演说，让学生去观摩、练习，进而相互批评，使学生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从而调动了学生演说的积极性。他引证了一些关于演说的人和事，他说：“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意见的一种手段，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因此我想到法国的一位大政治家，他名字叫退尔。他少年时只是一个店员，十八岁以前常常投稿，为报纸编辑所赏识，旋即被请去当编辑，后来他竟做了拿破伦第三的大臣。他的演说水平非常高，当他任满时，国会一般人对他都反对，但当他在国会做一席辞别的演说时，国会又全体投票要他留任。如是者三次。但到后来，国会不许他再做辞别演说了。可见天才的

演说吸引力之大了。”

在先生熏陶下，复旦学生都有演说的才能，在支持各项爱国运动中，进行宣传、鼓动，做出了贡献。于右任说得妙：“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如此看来，先生在学校中注重演说是有远大期望的。

一九〇六年，先生奉命处理留日学生学潮而东渡日本，复旦校长由严复继任。先生在日向留学生们发表演说，恳切陈辞，听者都很感动，学潮遂得平息。他演说中有“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一节，为当时张之洞所赏识，认为马相伯是“中国第一大演说家”。由于他演说从来没有稿子，那时梁启超在座听他演说，经常为之入迷，就记录下来，送给他指正。先生看了记录说：“我的演说只有梁启超能够原原本本记录出来”。

是年，从日本回来，又应两江总督周玉山的邀请到南京去做立宪讲演。在两江大操场讲了两个多小时，把世界君主、民主国家的政治利病和宪法的真正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讲得又通俗，又系统，听众都为之动容。

一九〇七年下半年，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宣称致力于提高国民程度，推动立宪政治。因康、梁都不能出面，乃请先生为该社总务员（相等于干事长），先生碍于旧交，勉予同意，并于十一月又赴日本，参加政闻社在东京、横滨等地的社员大会。一九〇八年年初，政闻社迁到上海，为清廷下令查禁而停止活动。

一九〇九年，先生应复旦校董会之请，复任复旦公学校长，又兼任江苏省议员。在他继任后，请于右任来校教授国学。当时于从事新闻事业，鼓吹革命，遭当局之忌，所办